

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移民与边地文化变迁

武沐, 陈亮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明代河湟岷洮边地设置的军事性卫所, 不仅为明朝巩固西部疆域提供坚实的武力后盾和军事保障, 还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文化移植。卫所移民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 其负载的汉文化对基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以致卫所成为不同于周边地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随着移民与少数民族间的互动交流日趋频繁, 周边少数民族渐染华风, 其生产方式、礼仪风俗、乡土方言均有所改变, 而移民群体建构的教育体系使重文之风日益浓厚, 对地方文化事业也有所促进。与此同时, 土官阶层作为明廷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 改汉姓, 修家谱, 更成为多元文化沟通融合的先行者。

关键词: 明代; 移民; 文化; 土官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8) 06-0113-09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8.06.017

因河湟岷洮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 自秦汉以来这里便有开发式的移民屯田活动。西汉赵充国曾在此屯田以防御羌族唐、宋时期吐蕃势力逐渐东进, 并开始成为该地区的土著居民, 西夏也曾积极经营河湟地区以防御吐蕃。明朝出于加强西北边疆防御的目的, 在河湟岷洮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戍边活动, 以隔绝蒙、藏之间的联系。这些迁徙而来的汉族军人及普通百姓在此屯垦戍守, 在增强军事管控的同时, 也意味着汉文化的移植以及边地民风、民俗的变化。以往学界对河湟岷洮地区及“西番诸卫”的研究多集中于明王朝的经略、卫所的设置及移民来源的考证。有关明代移民文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成果较少, 而对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科教文举的兴起则鲜有论及。鉴于此, 笔者不揣浅陋, 以求教于方家。

一、卫所与移民

明朝初年, 卫所军屯成为中央政府对河湟岷洮地区实施有效管辖的政治基础与军事保障。自洪武四年(1371)至洪武十四年(1381)间, 兼管军民的卫所在河湟岷洮地区陆续建立。洪武四年

(1371)正月, 河州卫设立, 后分为左、右二卫。十二年(1379), 左卫调至洮州地区, 设洮州卫指挥使司, 改右卫为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西宁卫设于洪武六年(1373), 后长兴侯耿秉文收集散亡筑城, 改置西宁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一年(1378), 西平侯沐英奏设岷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其中河州卫领七个千户所、岷州卫领千户所四、洮州卫领千户所五, 以上三卫隶属于陕西都司, 西宁卫领六个千户所, 归陕西行都司管辖。《明史》云:“明以武功定天下, 革元旧制, 自京师达于郡县, 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 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 调卫所军领之; 既旋则将上所佩印, 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①明廷在河湟岷洮地区陆续设置的一系列“边地”卫所成为隔绝蒙、番军事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卫所体系建立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性移民活动。明代军户来源主要有“归附”“谪发”“垛集”“抽籍”等途。^②河湟岷洮属“番汉交杂”之地, 番族部落众多, 然而卫所军户的主要来源并非原住民, 而是依靠大量内地移民不断充实

【作者简介】 武沐,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2016年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治理创新中的向心运动研究”(16JJD850003)、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明清时期陆路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交流”(16LZUJBWZY049)、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明清河湟多民族走廊国家认同研究”(15LZUJBWZY033)阶段成果。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89《兵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5页。

②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233页。

卫所,其中仅有部分故元官吏通过“归附”途径编入军籍,成为卫所士官。如西宁卫朵尔只失结、李南哥,临洮卫赵安,河州卫何锁南普等,均为此例。河湟岷洮诸卫所中大多数军户应是以明初征讨此地的军人为基础,此后不断从全国各省“谪发”“垛集”军户加以补充。由原住民组成的士兵,实际上并非卫所在籍的军人,其与民兵所起的作用相似,在无战事之时,仍需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军事卫所设立后的首要任务当属解决给养问题,而明代军队的给养主要依靠屯田,由卫所军兵开垦土地,以减轻百姓负担及转运粮饷之苦。正所谓“边腹内外,卫所募置,以军隶卫,以屯养军。”^①从而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按明代屯田制度,“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②。戍边将士的屯垦活动使河湟岷洮地区农牧交错的局面大为扩展,原有的民族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而这些边地军卫在职能及内部架构上也有别于腹里内卫,卫所不仅管军,也辖民,军队人数也远超普通军卫。下面就西宁卫、岷州卫、洮州卫、河州卫军人数量分别进行考证,以估算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移民的大致数额。《诸司职掌》载:

凡内、外卫、所,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一名为一百户所。其有卫分军士数多,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设总旗二名,小旗一十名,管领铃束,大小相维,以成队伍。^③

若按照每卫5600人,所1120人计算,河州卫、岷州卫、洮州卫、西宁卫4卫22所共军户2.464万户,但实际上这些卫所的军人数量远超此数。如明初河州卫的规模已非腹里军卫所比拟,洪武七年(1373),明廷将西安左卫兵分隶河州卫

后,河州卫实际上是由两个军卫组成,兵员超过万名。尽管如此,明廷仍“遣使者命邓愈发凉州等军士分戍碾北、河州等处”。洪武十二年(1379),河州左卫分离为洮州卫后,右卫即为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据嘉靖《河州志》记载,河州卫原有“官军九千八百八十八名”^④,其官军人数约为腹里卫所的两倍。但至弘治年间,河、岷、洮三卫戍军已大量逃亡,兵员匮乏,不得不奏请朝廷于秦州、巩昌等卫招募义勇。然即使如此,河州卫在嘉靖年间仍有“军卫户四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五百三十三”^⑤。

据《岷州卫筑城记》碑文载:“指挥马焯等官开设岷卫,统率马步左、右、前、后、中壮士万余筑城垣、建四门、造战楼、敌台百余座”^⑥。又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明初“岷州镇,属卫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马步官军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员名……岷州卫,军七千五百五十四员名。”^⑦从中可知,明初岷州卫仅5个直属千户所就有万余军卒,但至嘉靖年间,卫所军屯人员大量逃亡,官军规模骤减。《边政考》卷3《岷州卫》载:“官军原额马步五千九百一十三员名”,若除去“逃故、分拨凉州、轮班守御”等因素,实际见在“各城堡防守、摆塘二千五百九十名,留城八百八员名”^⑧。与明初相较,《边政考》所载官军数字已是军屯士卒逃亡之后的数字,所以明初岷州卫的移民数量应有万余户之多。

据《读史方輿纪要》载:“洮州镇属卫1,关5,寨2,堡24。马步官军六千七百十五员名。”^⑨其中洮州卫有马步官军5622员,高楼等关有马步官军72员,杨升等寨马步官军30员,济洮等堡马步官军450员名。此外还有舍人及士兵800员。这段史料应为嘉靖至隆庆年间洮州卫官军数额,而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90《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96页。

② (清)张廷玉:《明史》卷77《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4页。

③ (明)《诸司职掌》,据北图藏明刻本影印,收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

④ (明)吴祯:《河州志校刊》卷2《官政志·秩官》,马志勇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⑤ (明)赵廷瑞修,马理,吕桷纂:《陕西通志》卷33《民物一·户口》,董健桥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2页。

⑥ 此碑现存岷县博物馆,碑文载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⑦ (清)雇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143页。

⑧ (明)张雨:《边政考》,薄音湖校,见薄音湖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7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⑨ (清)雇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140页。

嘉、隆时卫所屯卒已大量逃亡,所以明初洮州卫的军户移民之数应超过嘉隆时期的6000余名。又据乾隆《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宁卫“洪武中官军户七千二百,口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四。”至嘉靖年间,“官军户三千五百七十八,口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三。”^①这说明随着士卒的大量逃亡,官军户的数量大量萎缩,但值得关注的是,军户的减少并未影响到人口数量的增加。虽然明后期的“海寇”之患使西宁周边战事不断,兵员损耗较大,使西宁卫缺少一个相对良好的人口增殖环境,但军户移民人口仍较明初有较大增长。

明代兵制,一正军需带余丁一名,以辅助正军,承担供给军装等职责,甚至有一正军佐三余丁的情况,而陕西都司甚至出现余丁三丁至三十丁在卫的情况。所以研究移民问题,也要将余丁考虑在内。按照一般军户家庭平均3人估算,明初仅河州卫、岷州卫、洮州卫、西宁卫戍边军人算就多达3万余户,按照1:3的户口比计算,移民人数约为9万余人。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河湟岷洮地区明初军事移民大致在7万人左右,民间移民则有3万余人,总移民数额当在10万上下。还有学者推测河湟岷洮地区仅江南移民就有9万多人,整体移民数量应在12万上下。^②虽然无法根据现有的史料文献核算出确切的移民数额,但明代河湟岷洮地区大规模的军事性移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同时,明代卫所士兵逃亡也是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虽然卫所士兵大量失额有军官隐占或匿籍等原因,但明后期卫所凋敝,屯田抛荒,卫所逃兵较多也是不争之事实,而这些逃往他省的士兵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河湟岷洮“移民潮”中的一员。

二、西陲边地移民与文化变迁

人是文化的载体,河湟岷洮地区的移民活动同时也是文化在空间地理上的传播过程,汉族移民的迁入与汉文化的传播是并行的。随着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间的交往频繁,汉文化对地方社会中的礼俗、语言均产生一定影响,学校教育的推广也带动

了文教科举的兴起,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化使地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

(一) 礼俗言语的变化

明代大量军事性移民的迁入意味着新的文化与“中土”礼仪的传播。“文化的播迁,固可由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战争、交通、贸易、通婚、移民……使各种差异的人民接触后,发生文化上互相影响的作用。尤其是凡重要的文化远播,都与移民有关,这是一种显明的事实”^③。

明代河湟岷洮地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军事性移民,这批移民不仅肩负着军事戍守,保疆守土的职责,同时也起到文化播迁的作用。士大夫阶层显然意识到移民群体中保存下来的文化及风俗对“羌风番俗”所产生的影响。《岷州志》云:

国朝洪武中,曹国公取其地,降其人,号为属番。其在前元降者为土民。总为里十有六,又徙内地民一里以实之,不堪为州,乃设军民指挥使司,戍以甲卒万,而建学焉。民之徙者,卒之戍者,居既久,土民举止、言语与内民无大相远,秀且文者,亦时有之。^④

随着内地移民群体与原住民群体的接触增多,土民及番民的举止、言语均产生较大变化,久而久之,士大夫阶层甚至认为其与内民无异。这种文化风俗上的变化并非限于一地,在西宁、河州、岷州、洮州等地均有所呈现。明人郑洛曾谈及明嘉、万年间西宁周边的社会情况,“西宁境内连络各川,何处非番。与土汉人等、桑梓连阴,名虽为番,实子民也。”^⑤在番族与汉族移垦者的接触交往过程中,逐渐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并由牧转农,以至“桑梓连阴”,与普通民人别无二致。《皇清职贡图卷》详细描述了清初河州、岷州等地回族、撒拉族、土族、藏族群体的风俗情况:

本朝雍正年间,以河州土百户韩玉麟、韩旭从征卓子山有功并授为千户,分辖撒喇、土族,其民所居距州治二百余里,男子冠履与内地民人无异。女系裙裹足亦同民妇,饮食风俗俱沿回习。^⑥

①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16《田赋志·户口》,崔永红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页。

② 晏波:《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兰州学刊》2012年第6期。

③ 杨成志:《文化播迁的差别方式》,见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④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17《艺文》,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291页。

⑤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00页。

⑥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版,第456~457页。

河州土指挥同知何福慧,元河州宣慰使锁普南之裔也。明洪武三年,锁普南率众归附,赐姓何氏,授河州卫世袭土指挥同知,管其所部番民。本朝因之,其番民居河州城东,男女衣服类撒喇土族,而饮食风俗俱与本城居民相同。^①

岷州马连川等十一族番民亦土番苗裔,明洪武初以番目祥巴古子追杀逆番有功,授以百户,世籍其众,后遂为后氏。本朝因之,其番民男妇服饰均与各番族相似,亦有如内地民人者,饮食风俗亦同。^②

明代河州、岷州等地卫所及州城周边的少数民族裔群体显然受到中原汉族社会风俗的影响,至清初已表现出与内地民人相近之处。除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族群有严格的饮食禁忌外,土族与藏族的饮食俱与州民相同。在服饰方面,撒拉族、土族男子的冠履与内地几乎相同,甚至在土族、撒拉族、藏族妇女中开始出现裹足现象。裹足本是汉族为主体地区的女性所应遵从的伦理教条,其本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折磨,少数民族群体接受这种汉族妇女遵从的道德律令,充分说明该区域所具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特殊区域文化特征。

在卫城及州城等汉人聚居之处,内地的岁时节日也完整的保留下来,如立春“前一日,里民具春幡,扮故事,曰社火,并赴公堂演春,乃迎春于东郊,岁于是乎告始。”^③立春在中国有三千余年的历史,民间及官方均极为重视。立春前一日,里民不仅要挂春幡,还要搞一系列的迎春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上元、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均成为地方社会中重要的节日。如:清明日“各家备钱纸、酒馔祭奠,各冢覆土”;中秋节“作月饼,具果品,祭月。次日,以饼果遗亲戚焉”;重阳日“亦有老人携子孙登高游咏者”^④。

当然这种礼俗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既有近城颇似汉俗者,亦有边远之地化于番者。在卫城、州城及周边适宜农耕且汉族较为聚居之地,由“番

转汉”的情况占大多数,因为这些地区汉文化较为兴盛,番族杂居于此,渐染华风,无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风俗习惯均有所改变,最终由番民转化为国之编户,甚至部分融入到汉族之中。据《岷州续志采访录·户口》载,其族类分为汉、回、土、番四类,其中“汉民之中,有曰族夫者,现在七百四十八户,前明旧为番族,隶诸土把总者也”。随着“番汉”之间交往的加深,边远土司所属土民之中,也有部分已渐成汉族。如雍正初,已废土司赵廷贤“所辖之四十八族,今为归安里”,光绪初,土司后振兴“所辖之八十户土民,改土归流,今赴属间井里”。此二里之土民,均为州之编户,已成汉户。宕昌土司马继贤之土民十六族,麻竜土司赵士林之土民三族,攒都沟土司后漉之土民二百九十名,“虽号土民,久与汉民无异。”^⑤这说明,汉之礼俗率先在卫所、州县及驿道附近生根繁殖,并渐进式的一步步向周边区域蔓延扩展。正如明人云:“山林通道,樵牧往来,番汉无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资给”,“我既示恩,番必怀感,日与土人相亲和睦,不出五六十年,与西纳等族可化为良番。”^⑥随着汉族移民群体与原住民通过经济、文化等多种形式的交往,才逐渐使生番渐成熟番,再由熟番化为齐民。

除礼俗之外,移民群体对各地方言也产生一定影响。清代陈如平云:“按岷人言语,与川、陕、直隶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民间方言:呼天如铁音,呼日如热音。谓父曰达,谓伯父曰爹爹,伯母曰阿赧,东乡如此。谓叔父曰爸爸。谓姑母曰娘娘。谓妻之父曰伊父。”“又附郭人言勺、说、水等字或作唇音。乡间言风、房、非、扶等字,横口呼而不作唇音。言的、定、丁、听等字作舌腹音而不作舌头音,此皆岷人之方言也。此外,若西南近番者,多作番语,则非译不可通矣!”^⑦除川、陕、及直隶等地,现代学者刘光裕通过对岷县方言中几个特殊读音的探源中,找到了湘音、蜀语、江

①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② (清)傅恒《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版,第498页。

③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11《风俗》,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191页。

④ (清)张彦笃主修,包永昌总纂《洮州厅志校注》卷2《舆地》,张俊立校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

⑤ (清)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户口》,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439页。

⑥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3《艺文》,崔永红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4页。

⑦ (清)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方言》,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447页。

浙吴方言等对岷县话的影响。如“世界”中的界字只在此处发gai音,在其他地方均读jie;“街”字读gai,这些是岷县方言受湘音影响的表现。^①同样,在洮州方言中也保留有六安、信阳、歙县等地的词汇,如六安方言中的“熄火”意为终止;信阳方言中的“炕馍”即为烤馒头;歙县方言中的“糝”表示羊肉特有的膻味等等,这些词语在洮州方言中均有相同的发音和词义。^②以上若干例证皆说明岷州、洮州的移民群体来自于五湖四海,从而将全国各语系中的部分发音融入到岷州、洮州的方言之中。

(二) 文教科举的兴起

明代以降,河湟岷洮区域文教科举逐渐兴起,应试中第者虽远不及江南富庶之地,但较前代已有长足发展。清人汪元綱云:“岷当成、弘、正、嘉之代,士之擢巍科、历崇阶者,蝉联不绝。”^③这不仅与大量迁徙于此的戍守军士及平民有关,也与明朝政府重视学校教育有莫大关联。明朝立国之初便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④的文教政策,进而广设学校,培养人才,开科取士,选拔贤能。在这种国家文化政策的大背景下,兴办学校也成为评判河湟岷洮地区主政者的政绩指标之一,如明人袁福征在谈及岷州主政者的职责时云:

莅斯治者,惟在罄其忠诚,敷扬德教,彰显皇猷,绶来御侮。谨庠序,申孝悌,用夏变夷,俾境内无虞,军民安辑,共享治平之乐。^⑤

这段文字不仅点出兴办学校对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更反映出“用夏变夷”才是学校教育最核心的目的之一。明朝开办官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教化,也为培养人才,这些均与河湟岷洮地区的移民潮有较大关系。来自中土的士民们素有

读书之习惯,科举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设立儒学本质上也是迎合移民子弟的读书需求,为该群体的发展提供上升的平台及管道。有明一代,西北学校教育的普及程度远胜于元代,据统计,明代甘宁青地区有记载的学校共计60所,书院18所,而元代在该地区设立的学校仅有10所。当然,这也与元朝不太重视教化,科举制度并未真正得以贯彻有关。在明代河湟岷洮区域的军卫、府、州之中,卫学、儒学、社学均普遍设立。如:宣德三年(1428),都督史昭奏设西宁卫学,后于成化及嘉靖间重修;^⑥河州府儒学于洪武五年(1342)设立,初设之时,师儒5名,廩增各40名。后河州撤府建卫,改为卫学,至成化间设州,又改为儒学。据嘉靖《河州志·学校志》载,河州学校官藏书籍包括:《为善阴诫》《性理大全》《周易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资治通鉴》等书籍。^⑦岷州卫学设于洪武十七年(1384),有儒学教授1员,训导4员。^⑧洮州卫学则是永乐十七年(1419)由指挥李达设立。^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卫所子弟及普通百姓得以入官学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此后,中试及第者络绎不绝。嘉靖《河州志》、乾隆《西宁府新志》、康熙《岷州志》、光绪《洮州厅志》等方志有大量乡举、进士及贡士的记载。其中岷州乡举19人,进士7人,贡士182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岷州贡士之中有1人为藏族,名为乣旺,其人“通经足用,岷人称之勿衰,于番有光矣。”^⑩此人后任湖广郴州吏目;西宁卫进士2人,举人1人,武举1人,武科进士1人,贡生8人。^⑪河州进士6人,举人18人,岁贡104人,例贡38人;^⑫洮

① 刘光裕:《岷县话中几个特殊读音的探源——吴方言与岷县话》,《岷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7年版,第263页。

② 卢永林:《明代汉族移民对洮州地区的影响》,《求索》2016年第4期。

③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19《艺文》,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309页。

④ (清)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

⑤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18《艺文》,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298页。

⑥ (清)张廷玉:《明史》卷174《史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81页。

⑦ (明)吴祯:《河州志校刊》卷2《学校志》,马志勇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⑧ (清)张廷玉:《明史》卷75《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7页。

⑨ (明)李贤:《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页。

⑩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15《选举》,岷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257页。

⑪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29《选举》,崔永红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0~522页。

⑫ (明)吴祯:《河州志校刊》卷2《学校志》,马志勇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7页。

州卫进士2人,贡士63人。^①这些进士、举人、贡生均为儒学生员及科举功名者,从其户籍及历任职官等信息亦能看出河湟岷洮地区科举文教的特点。在这些进士中,除1人为民籍外,余皆为军籍。从民族身份上看,仅西宁卫进士李玘为土官之后,属少数民族裔,其余均为汉族军人后裔。这表明正是明代的卫所制度推动了河湟岷洮地区科举的发展,具有移民背景的卫所汉族子弟是科举文教的主体。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该地区大量的军户有关。据嘉靖《全陕政要》载:

(岷州卫)(民)户四百四十二,口五百六十二;军卫户口,户三千一百三;口五千三百八十。^②

(洮州卫)(军)户三千一百一十三,口五千二百八十二。^③

(河州)(民)户五千二百九十,口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六;军卫户口,四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五百三十三。^④

上述三地,岷州卫军户数是民户数的10倍之多,而洮州卫未登记民户。河州的情况则比较特殊,明洪武初年即为河州府,实行府、卫分治的模式,其治下有大量的民户,此后明廷撤府,由河州卫代管民户。至成化年间,明廷复设河州,所以当地的民户远多于军户。无论是卫所士兵抑或迁徙之民,均已纳入明王朝户籍赋役体系之中,或军、或民、或匠、或灶。而在这些户役中,尤以军人的劳役是最重的。王毓铨先生认为军户实际上承担了双重劳役,既要当差杀敌,又要耕作种田,身份近乎与奴隶相同。加上明代户籍制度的世袭性,军户世代为军,加之卫所官吏盘剥无度,使其苦不堪言。在这种较为艰困的生活环境下,读书应试成为移民军户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解释了卫所子弟崛起于科场的原因所在。

而对于缺乏里甲制度的土官辖区而言,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并未向明王朝纳粮当差,其钱粮词诉皆听于土官,所以他们没有读书应举的权利,似乎也没有这种需求。从土官的角度出发,这些地方豪酋也不太乐见土民读书习儒。在对贵州水西土司的研究中,温春来先生发现水西君长一直禁止其属民入学读书,即便是贵州宣慰司学也与原住民无关,宣慰司学本质上仍扮演军卫儒学的角色。^⑤土官、土司等统治上层虽然通文理者多,但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司属民着实微乎其微,其本质原因在于土官、土司不愿国家王朝的影响力深入其属地,进而动摇其统治基础,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土司属民参与文教科举的机会。

三、土官阶层的“向化”现象

明朝政府除在河湟岷洮地区遍设卫所外,也广设土官以辅助地方政府管理基层社会。土官既是明廷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也是朝廷改造地方社会的首要对象。汉族移民的迁入及汉文化对地方社会的不断渗透,无疑会对“化导”土官阶层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土官子弟习儒入仕

土官常与卫所官员交往,甚至朝贡入京之时需与皇帝接触,所以在礼仪方面,明廷对土官有较高的要求。明廷认为土官熟悉“礼体”,可有利于任用与管理,所以礼仪教化成为袭职的硬性条件。《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癸亥条”载:“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⑥明朝政府针对此情况,于西南、西北边地卫所遍设儒学,选土官子孙以教之。此后,明廷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华风,以格冥顽。”

① (清)张彦笃主修,包永昌总纂:《洮州厅志校注》卷11《选举》,张俊立校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74页。

② (明)龚辉:《全陕政要》,收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③ (明)龚辉:《全陕政要》,收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④ (明)龚辉:《全陕政要》,收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⑤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8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23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版,第3476页。

不入学者, 不准承袭。”^①《明史》则详细记录了土官子弟入太学读书的内容。

凡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土官、外国生、功勋臣及勋戚大臣子弟之入监者, 奉监规而训课之, 造以明体达用之学, 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 以六经、诸史为之业, 务各期以敦伦善行, 敬业乐群, 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②

虽然明廷刻意强化对土官子弟的儒化教育, 甚至在政策上带有强制性, 但土官学习汉礼并非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以河湟岷洮地区为例, 明初大批戍边将士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分布, 而且主导了该地区的政治格局及深刻影响着文化格局, 汉文化的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 面对这些能对地域社会施加强力影响的汉族移民群体, 作为原住民的土官阶层必须想方设法融入其中, 为获取中央王朝授予的政治权威, 土官阶层熟习汉族移民群体的儒教规范也成为必然。另一方面, 明廷在西北地区实施“以流控土”的管理模式, 在流官主导的卫所体系下, 土官仅起辅助作用, 而拥有较高儒教素养的土官显然更易获得汉族官吏的信赖与认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土官积极推动子弟学习儒家文化, 既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 又是主动接受汉文化的表示。

如西宁卫土官李昶, 其母夏氏送其至名师门下饱习诗书, 深受儒家汉学文化之熏陶, 明人程政敏称赞其“读书尤工笔札”, 足见其汉学功底之深厚。此后, 土官李氏以仁义治家, 以诗书传家, 尤重后人之汉儒研习。有明一代, 李氏后裔有3人为文、武举人及进士, 家族中亦有多人入太学读书。如李玘为“将门子, 而喜读书, 不事华饰”, 于其父建立的家学基础上, 埋首经籍, 投身场屋, 为成化辛酉科进士, 后任尚宝司丞; 东府六门李完为嘉靖戊子科举人, 任直隶衡水县令, 卸任归乡后“闭门读书, 无间寒暑。闭影公门, 人高其节”^③。子辈李瑁、孙辈李寅、李定、李宜, 皆为国子生、庠生; 七辈李光先为万历癸未科武进士, 历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堂上金书等职。明代武举考试注重

文武双全, 其中兵法韬略尤为重要, 所以武举是以策论定去留, 以弓马定高下。土官李氏后裔在习儒读书的基础上, 仍保有少数民族特有的鞍马骑射的传统, 尤为难能可贵。又如庄浪卫土官鲁麟“自幼质美而嗜学, 善诗文, 工书翰”^④。其所撰写的《敕赐感恩寺碑记》保存至今。临洮土官赵济“优游山水, 咏歌自适, 有和唐诗《南川稿》藏于家。”^⑤其后人赵重琮则“尤通经史, 雅意文学, 每以屯政所赢厚宾与礼士林。”^⑥土官的汉文化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在与汉族移民群体的交往接触中, 土官不断学习、吸收汉族文化之精髓, 这不仅使其在协助汉族官吏管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游刃有余, 也使其成为本土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二) 土官采用汉姓

土官采用汉姓也是其接受明廷教化, 沾染汉风习俗的现象之一。许多土官家族均自称明朝皇帝赐姓于本族, 如庄浪卫土官鲁氏, 河州卫土官何氏, 岷州卫土官后氏等等。事实上, 明廷出于褒奖异族, 笼络民心之目的, 赐土官汉姓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但多数土官改用汉姓的原因应与河湟岷洮地区大量移民有关。本质上, 少数民族改用汉姓是与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和良好的民族关系不可分割的, 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 原住民与汉族移民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汉族的文化、政治影响力使周边少数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或者改用汉姓乃至汉名, 而土官阶层恰恰是与汉族民众接触最为频繁的一个群体。

明代, 河湟岷洮地区土官至多自三辈始采用汉姓汉名。如岷州卫土官后朵儿只班, 其父名哈撒尔, 该家族称其后姓乃明朝赐姓。西宁卫土官贡哥星吉之子名祁锁南, 后人取名祁贤、祁英; 土官南木哥之后裔以汪为姓, 后人名汪失加, 汪澧, 汪福。除改用汉姓汉名外, 部分土官也吸收排行、字、号等取名方式, 如临洮土官会川伯赵安, 字仲磐, 其子赵英, 字廷杰, 孙赵铉, 字宗器, 子赵济, 字子望; 会宁伯李英, 字士杰, 孙李玘子德

① (明) 申时行:《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6页。

② (清) 张廷玉:《明史》卷73《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93页。

③ (清) 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27《献征》,崔永红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7~478页。

④ (明) 肃王:《重修玄真观碑记》,《永登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813页。

⑤ 刘郁芬:《甘肃通志稿》卷76《职官十四·土司》,影印民初稿本。

⑥ (清) 升允:《甘肃新通志》卷42《兵防志·土族》,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

贞,子宁字东村,子崇文字辅国;高阳伯李文,字尔雅,后人李凌霄,字万程;河州卫土官锁南子何铭,字德新,铭之孙何勋,字朝用等。还有一些土官仅在本族名字前冠以汉姓,如河州珍珠族土官名韩端月坚藏、韩领占巴、韩扎矢巴。相较于以上与明廷关系紧密的土官,那些领地较为偏远,与朝廷相对疏离的藏族土官,其改用汉姓的时间则较晚。如洮州卫杨氏土官明初归附时,始祖名些地,子为赞卜必力,三世扎西,四世扎西子噶杰等,均未改用汉姓,直至明正德年间噶杰子旺秀袭职后,才改用杨洪这个汉名。诚然,少数民族因受汉族王朝政治上的强大压力以及“贵夏贱夷”的社会观念等因素影响而改从汉姓,但大量汉族移民群体的迁入,汉文化的不断渗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广泛交往才是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社会的实际景象,正是这种民间的交往促进了河湟岷洮地区少数民族向汉族逐渐靠拢的客观事实,而改汉姓只是民族交往深入,民族关系融洽的表征之一。

(三) 土官家族编纂家谱

从中国家谱历史的发展脉络看,自宋代始,家谱的编纂方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此时,家谱作为官员铨选及门第望族联姻依据的作用逐步消失,其主要目的在于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但宋、元时期,民间修谱之风尚未盛行,至明代民间修谱才开始增多,清代则达到顶峰。因明王朝长期致力于儒家礼教的恢复与重建,至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奏《令臣民得祭祖立家庙疏》获朝廷恩准,自此民间修家谱正式获得官方认可,修家谱、立家庙、祠堂尤其受到汉族底层百姓的青睐。此后,民间家谱数量倍增,编修家谱成为日常百姓家中的头等大事。而这种民间修谱之风也随着汉族移民逐渐传入河湟岷洮地区,少数民族受此影响,开始编修家谱,特别是当时的土官世家皆有家谱。但令人惋惜的是,明代所修土官家谱历经兵燹,多已散佚,保存至今的土官家谱尚有青海民和李土司《李氏宗谱》、甘肃庄浪鲁土司《鲁氏家谱》、青海西宁祁土司《祁氏列祖家乘谱》、甘肃宕昌马土司《马氏世谱》等。保存其中的明代谱序成为重要的研究史料。

谱序主要包括本族人或外族人所写序或者跋

语,是族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家族历史、迁徙经过、修谱缘由、族谱体例等。虽然谱序篇幅较小,但内容丰富,所以要研究族谱,首先应从谱序着手。明代民和李土司家谱序及跋共有6篇存世,均收录于《西夏李氏世谱》卷一《谱序跋》中。其中最早的一篇谱序由临洮府知府刘昭于景泰四年(1453)撰写。刘昭在序文中谈及李昶对于家族乃至地方之影响,上曰:“公家之谱也,于是知公之世代,不独以派衍姻亲重,而且以诗书行谊重,非有家风,其能若是乎。夫家之风尚,在于一家,使家家习其风尚。由家而乡,乡而国,国而天下,莫不向风。”《李氏忠贞录》则是请甘肃巡抚赵载作序,文中言及家谱分为玉音、族谱、赠遗三部分,其中“夫首之玉音,重君命也。次之族谱,重世系也。次之以赠遗,笃交谊也,且以垂示后人”,从中可以看出,历经几代人续修后,李氏族谱体例已近完备。《李氏世系渊源谱》由东阁大学士王家屏万历年间为之作序,上载“今都金君以谱世袭问余,屏早稔其文武传世,爰不辞谫陋而为之谱”^①,该序文主要书写了李氏一族之源流及家族世系。庄浪鲁土司明代谱序有《鲁氏忠贞录原序》及《鲁氏家族谱原序》保存至今。《鲁氏忠贞录原序》同为甘肃巡抚赵载撰写,其中谈到鲁氏族谱的体例,曰:“北崖子阅其帙,曰玉音,累世所被纶綍也;曰族谱,曾大父勋绩,封爵之由也;曰赠贺哀挽,则名公遗厥。”其在内容体例上与李氏族谱十分相似。《鲁氏家族谱原序》由陕西按察使副使朱朝聘撰,该序文主要谈及鲁氏之源流及世袭等内容。^②宕昌马土司谱序则由岷州进士刘世纶写序,谱序曰:“宕昌之有马氏,非旧籍也,系出东汉伏波将军援之后,家秦西扶风县,累有封袭,至晋谪戍四川黎州安抚司安置。历唐至元,因功迁岷州卫千户指挥使,携眷属百余,徙占岷城南一百二十里地宕昌,遂家焉。招蕃抚众,有明(以)来,武功愈显,民庶赖之”^③。主要言及宕昌马姓之源流,马氏家族的迁徙经历等重要信息。通过以上地方官员的赠序可看出汉、土官员的交流与互动频繁,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

另一方面,以上土官家谱序中多反映出忠臣孝

① 李鸿仪编,李培业整理:《西夏李氏世谱》,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② 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1页。

③ 陈启生:《宕昌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子、义夫节夫等思想。如: 《李氏忠贞录》言: “今录王言, 顷刻不忘君也。录世系, 朝夕不忘亲也。垂训后裔, 爱所亲也。捧读王言, 宜思委身报国”。^① 李氏之《家谱八箴》包括, 孝箴、弟箴、忠箴、信箴、礼箴、义箴、廉箴、耻箴。《鲁氏忠贞录原序》则载: “盖忠莫大于图报, 孝莫大于继述。今录王言, 顷刻不忘君也; 录世系, 朝夕不忘亲也。垂训后裔, 世守忠孝, 爱所亲也, 岂图为简策之光, 耀羨家世哉!”^②。这些内容无一例外的反映了汉族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的强烈影响。而自宋代以来, 封建地方官吏常用以亲亲之道为特征的宗族制度来推行教化政策, 由土官家族成员作为教化的先行者, “使家家习其风尚, 由家而乡, 乡而国, 国而天下, 莫不向风。则四海荡荡平平, 天下咸宁无事, 帝王恭己无为之化, 将复见于今日

矣。”^③ 这正是明政府“以忠孝治天下”的初衷所在。

结 语

综上所述, 明初大规模的军事性移民对河湟岷洮边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明廷以卫所为中心, 通过军事性的戍边屯垦活动, 不仅使西北边防得以巩固, 也使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通过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间的友好接触与交往, 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 也使其受到汉族文化的熏染, 并不断增强“国家王朝”的正统观念。正是这些移民群体所负载的文化对当地社会的不断渗透, 才促成了明廷国家力量的不断深入, 对边地社会的改造才会持续不断, 同时也为边地社会的内地化奠定基础。

Immigrants to Hehuang – Mintao region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borderlan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U Mu & CHEN Li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Ming dynasty set up a series of garrisons in Hehuang – Mintao region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a strong backup force and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north borderland of China ,but also resulted in a large – scale immigrant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mmigrants of garrisons were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a local culture ,because they exerted much influence on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thus ,making garrisons a uniqu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unit different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more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immigrants and the local minorities ,the latter gradually learned Han culture ,whose production mode ,etiquettes ,customs and local dialects had undergone changes. Besides ,the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immigrants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th education and loc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the chieftains ,a significant force for the local governance ,adopted some Han surnames ,wrote a new genealogy and became the forerunner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Ming dynasty; immigrant; culture; chieftain

(责任编辑 伍琼华)

① 李鸿仪编, 李培业整理: 《西夏李氏世谱》,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46页。

② 王继光: 《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年版, 第49页。

③ 李鸿仪编, 李培业整理: 《西夏李氏世谱》,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版, 第142页。